

历史的废墟 与艺术的王国

周海波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海波，1958年生，山东昌乐人。1982年初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近年来，在《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郭沫若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出版有《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副主编）、《爱情新诗鉴赏辞典》（副主编）、《鲁迅研究》（副主编）等。

序

郭沫若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史学家，史剧家。他的历史剧创作和他的新诗创作，同是发端于“五四”，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他在这两个创作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郭沫若的诗剧、史剧问世不久，就引起了学人的瞩目。如果从损（沈雁冰）发表于1922年5、6月间的《〈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批评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从邓中夏发表于1923年12月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肯定郭沫若早期诗剧、史剧“表现民族的伟大精神”算起，历史已经走过了近70个年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瘦竹教授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率先对郭沫若的历史剧作系统的研究，科学地阐释了这些历史剧所遵循的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原则，以及这些悲剧作品所具有的崇高的、悲壮的悲剧精神。但从5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在这个课题研究领域内也不断地受到“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干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

论，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为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广阔前景。十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过去几十年无法比拟的成就，同样，包括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空气的活跃，除一些老专家、学者关心和参加郭沫若研究的工作，如王瑶教授发表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一文，提出了郭沫若的剧论已经形成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体系，并科学地评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以中青年为骨干的研究者的人数大为增加，特别是一些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年轻的研究者，以他们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成果步入这个领域后，立即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周海波同志便是这些年轻学者中的一个。

据我所知，《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这部约20万字的书稿，周海波同志花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作者不满足于以往从社会学角度去探讨历史剧“借古讽今”、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外在的社会效能的那种研究模式，而是把研究重心转向对历史剧文学功能本身的总体认识，即以郭沫若“发展历史的精神”的创作主旨为线索，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大背景，试图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意蕴、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评价。研究视角的变换，使作者有可能在阐释“郭沫若整体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及其心理过程在历史剧创作中的表现”这些问题时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对于郭沫若在史剧创作中所包容的文化寻根意向，以及作品竭力开掘的民族精神底蕴等问题的论述，尤其显得周密而深刻。

周海波认为，郭沫若历史剧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意识，所构成的独特的艺术方式，是从中华民族文化固有精神的深层

升腾起来的，“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讽今’，而更主要的在于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现实选择的探索、对于未来建设的昭示”。周海波还认为，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把握和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地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意义与独异的美学价值；其中关于历史剧的文化命题，由于史学家兼史剧家郭沫若的精湛研究和深厚修养，也使剧本更具有艺术张力。由于作者的立论是从郭沫若的作品实际出发，论证严谨，因此不仅从文学的范畴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而且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海波同志在著作中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死亡意识”的探讨。虽然研究者们过去也曾很好地研究过郭沫若历史剧的悲剧意义，但对剧作家的死亡意识这个重要问题却忽略了。周海波从审视郭沫若的“死亡即是睡眠、休息”这一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发现它同郭沫若所追求的宁馨静穆的审美境界密切相关，同老庄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作者在“死亡与东方文化传统”、“死亡的价值意义”、“自杀：古典人格美的完成”这些章节里，探讨了郭沫若的死亡意识所体现的东方神秘感，人物的死亡价值以及郭沫若对自杀所赋予的崇高的社会意义。作者探讨的这些新鲜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郭沫若的悲剧文学，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这部著作采取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清理传统文化思想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影响，又阐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注重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度开掘以及对历史剧特殊表现方法的研究。明年是郭沫诞辰100周年，周海

波同志奉献的这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将是很有意义的纪念。我期望着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在郭沫若研究这块土地上耕耘、收获！

黄侯兴

1991年6月23日于北京车公庄寓所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命题	(3)
一 东西文化背景中的文化理想	(5)
1 文化探求在时代条件下的功能转化	
2 复兴民族文化的真谛	
3 时代条件下的审美选择	
二 五四文化论战中的文化选择	(44)
1 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2 理想文化的张扬	
3 戏剧对历史的艺术选择	
三 文化重构中的现代文化精神	(67)
1 社会使命与民族文化	

- 2 理想人格模式的创建
- 3 文化刨根与反秦倾向

✓第二章 作为一种文学的历史剧……… (92)

一 真实性与艺术秩序的新整合… (95)

- 1 主体观照的真实性原则
- 2 对于历史把握的真实性
- 3 接受理论与历史剧的真实性原则

二 历史的发现与心灵的发现……(115)

- 1 史剧作家的心理素质
- 2 历史剧创作的心理过程
- 3 定势效应与艺术之美

三 神话：现代戏剧冲突的文化阐释 (136)

- 1 历史重构的艺术可能性
- 2 “仇父”与“~~恋~~母”结构
- 3 神话原型的复活

✓第三章 文化舞台上的浪漫变奏……… (156)

一 发展历史的精神……… (157)

- 1 历史精神的现代发掘

- 2 时代精神的历史显现
- 3 发掘与发展的艺术关系
- 4 例证分析：《虎符》的艺术世界

二 死亡主题与生命意蕴………(188)

- 1 死亡与东方文化传统
- 2 死亡的价值意义
- 3 自杀：古典人格美的完成

三 女性视界及其诗意美的诞生…(213)

- 1 东方女性：走向诗美的天国
- 2 价值体现：脆弱的“女神”
- 3 女性与审美：选择中的困惑与冲突

第四章 历史研究与历史人物的再创造(235)

一 屈原研究与屈原形象………(236)

- 1 屈原形象的历史确证
- 2 时代认同
- 3 思想认同
- 4 艺术创作：再现历史与表现现实
- 5 浪漫主义：对历史的超越

二 秦始皇观及秦始皇形象………(267)

- 1 人物的生理学研究

- 2 人物的历史研究
- 3 人物的思想研究
- 4 人物研究与形象创造
- 5 修改与发展

后记

引 言

本书的二十万言，与其说来自我对郭沫若历史剧艺术的偏爱，不如说来自对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某种文化意蕴的注目。我当然知道，并非人人都对郭沫若历史剧抱有好感，也并非人人都对其记录下的历史的面影和社会的心态感兴趣。但我同样并不认为这是在浪费精力和时间。当一种文学或文化现象放置到我们面前，并进而予以思考分析时，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力，并以自己的理解参预其中。

我也记得歌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①郭沫若历史剧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有了六十余年研究历史，但仍然需要“重新加以思考”，挖掘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

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郭沫若历史剧经过六十多年的研究，在方法上形成了定型的研究模式，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论述历史剧“借古讽今”的功能，将郭沫若历史剧社会意义的发掘引向较高的研究层次，然而，对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民族精神矿

①《歌德的格言和感想录》，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藏的郭沫若历史剧，决不能只囿于狭窄的一隅，还必须把它放在动态的中西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大文化多学科多方位的审视。郭沫若的历史剧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情境在创作过程中的反映，也仅仅是某些历史事件在现时社会中的新的阐释与新的发展，而且也是郭沫若整体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及其心理过程在历史剧创作中的表现。特别是，当历史剧不仅是作为某种手段，而且作为对民族文化形象体现与深度开掘，那么，郭沫若的历史剧必然体现着作家的历史文化的主体性选择，在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中，实现历史剧特殊的文学功能。正是如此，我将郭沫若的历史剧看作是作家在历史的废墟上挖掘、整理、创造而成的一座辉煌的艺术宫殿，它显示着作家的文化选择意向及其某种文化创造精神。因此，将研究目光从外在的社会功能的关注转移到对历史剧文学功能的总体认识上，实际上是对一种历史剧观念的重新理解与把握。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面对现代戏剧创作的色彩缤纷、眼花缭乱的现象，很多人被表面的现象所蛊惑，急于去争论是非，但却恰恰忽视和忘记了真正要去把握和理解的。当然，历史剧本身的复杂性和它所涉及理论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还难以对它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所企求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它；理出一条历史与戏剧之间的内在贯通的河道，从文学本身来思考这个问题，从美的角度认识历史剧的独特品格。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所取的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这一题，能够促成我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命题的文学意义的理解，并由此而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命题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命题，深刻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是接受了西方的各种哲学、文学思想的影响，力图在时代的大潮面前超越传统文化的规矩，一方面又带着传统的种种因素，在精神上不可能割断与民族文化的血缘关系。从这一冲突出发，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所建构的文化世界与艺术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精神。因为，历史剧的特殊取材方式，它的进入历史的现代手段，都使我们有可能把握民族精神发展的脉络。

对于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命题，当然不仅仅来自于一种现实的需要，从历史剧创作的独特性角度看，将历史剧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剧的审美特质。二十年代初，曾经有人反对创作历史剧，认为“历史剧只能叙述旧的习惯和传统，而不能加入（或者不便加入）打破习惯

传说的新思想”①。这是对于历史剧叙述功能的不理解。历史剧除取材于历史材料之外，其本身的内在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它所传导的不仅是历史的表层可见现象，而且以它特别的方式传导出发自历史底层的声音。这是其它品种的文学作品所难以企及的。文学的发展历史表明，文学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揭示人类生活、特别是关于人类精神本身的未被认识的那部分东西。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尤其需要对于国民精神与整个民族文化之间相联系的那部分作出深入的揭示。历史剧，在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正如郭沫若所说：

“植物吸收动物的死骸以为营养；动物也摄取植物的死骸以维持生存，大冶造器，溶化许多古铜烂铁而成新钟。造物生人，只把陈死的原素来辗转搏拟。……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吹嘘些生命进去，他们不能禁止我，他们也没有那种权力来禁止我。”②

从这个意义上，郭沫若选择了历史剧，并由此趋向于文化的探讨。

①蒲伯英：《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戏剧》1921年1卷4期。

②《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

一 东西文化背景中的文化理想

对于那些感应着时代气息的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东西文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从五四前后规模浩大的文化论战开始，它使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都必须在繁纷的文化世界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作为文化伟人，郭沫若自觉投入到现代文化运动之中，以自己的目光批判着传统文化，思考着中华民族未来文化的调整与发展。并以自己博大深厚的思想与学识，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

我们在郭沫若历史研究论著中，能够直接窥见到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在其历史剧创作中，仍然可以悟到某种文化批判的意义。可以说，还很少有人能象郭沫若那样，一方面站立于现代社会的高度，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方面深入到历史的内层，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建构的根本特点。这里着重探讨郭沫若在中西文化大潮中的文化建构意向。

1、文化探求在时代条件下的功能转化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历来人们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文化问题的激烈争论。历史学派常常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的遗产，或者是传统的行为方式的全部总结。心理学派往往把文化视为个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总映象，或者是满足个人心理动机所选择的行为模式。结构功能主义者强调文化是由各种要素或文化特征构成的稳定体系。在中国现

代文化研究史上，有关文化概念的观点，同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①。而蔡元培则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②梁启超则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③文化观念的不同，关于人类文化的态度随之而迥异。因此，在讨论郭沫若与东西文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清理郭沫若关于文化的观念。在郭沫若那里，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层面，文化是一个历史期内的遗迹、遗物等的综合体。这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郭沫若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从这个概念引申出来，文化则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涵盖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事物。郭沫若说：“现在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这许多研究物质的科学、进步的科学，都是我们的文化，或者从某种观点上来说，这些才是真正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文化被理解为“人类的劳动对于自然的不断的征服”。郭沫若认为这是从“发生史的观点”④来观察文化的结果。

从文化的发生原理看取文化，必然注重于文化的历史发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3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② 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9日。

④ 《青年与文化》、《沫若文集》11卷第88页。

展。文化，如果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概念，那么，它应当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一种既成的观点来要求于文化时，必然带来文化的混乱。正是这样，当人们笼统的大谈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者盲目地大叫保存国粹，实际上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化的真实涵义。郭沫若从来 没有表明自己的派别观点，但当他清理出文化概念的历史发展线索时，在实际上他获得了一个把握文化问题的高度，掌握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建立了历史的发展的文化观念。郭沫若说：“文化是进展的东西，这文化的最初形态，也是和小小的单细胞一样。慢慢由最初的原始的简单形式分化起来，集合起来，扩大起来，便形成了我们今日的文化。它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没有间断，直到现在，它的规模是更宏大，范围是更深远了。因而在古时看来是文化的，在今日看来已经是非文化。文化始终是进展着的。从原始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一直到铁器时代，文化也是一步一步的呈着波状的进展。”①这是说，文化是连绵不断的、变迁的和积累的产物。从文化的连续性来看，改变传统和使某些传统让位、是很困难的；从文化发展观念来看，文化或多或少处在变动之中，具有创新能力，并逐渐导引文化传统的变化。从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文化模式，是由民族潜意识造成的。郭沫若根据这种观点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试图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发掘传统文化的模式，或者说寻找个体民族固有文化之根。

①《青年与文化》，《沫若文集》，11卷，第88页。